

清詩選

清 诗 选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敏
封面题字：高寿荃

清 诗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0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4}$ 插页 2

198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3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7,700

书号 10019·3641

定价 1.55 元

前 言

—

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唐代诗歌的成就最高，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宋诗有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毛病，但在反映民族矛盾和艺术特点方面，也有新的成就。元明两代，文学的主流转向戏曲、小说，诗歌比较衰微。明末清初，出现了象顾炎武、王夫之那样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思想，并且诗功也深的诗人；象钱谦益、吴伟业那样才学富足，能够转移风气的诗人，本来具备了振兴诗歌的良好条件。但清代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又使它的创作成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清初抱有反清的民族思想的诗人，在当时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写了不少表现民族大义、具有爱国精神的诗篇，使清诗闪耀出战斗的光芒。但随着汉族反清武装力量的失败、消灭，清朝统治的巩固，以及思想钳制的加强，文字狱的株连，功名利禄的引诱，改变了儒林的风气等，使诗歌创作受到消极的影响。加以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又搜访、销毁了许多内容“有碍”的禁书，清初不少优秀诗篇因此被消灭或得不到流传。这是清诗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巨大的限制。

十八世纪以后的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相对安定、繁荣的同时，又日渐出现了社会的黑暗衰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本来可以刺激、促起诗人的奋发，但由于清朝在政治、文化上的严厉钳制，由于一些人被表面上的“盛世”之局所迷惑，诗人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方面，还有所忌讳、回避和冲淡。他们多借模山范水、批风抹月和咏史咏物来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或牢骚抑郁，尽管诗的功力和技巧都相当不错，但思想内容不免相对淡薄。清代全盛时期的诗歌，不能象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那样鲜明有力地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的主流，这又是清诗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巨大的限制。

尽管存在如上所述的局限，清诗惩元明之失，兼学唐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成就还是超过元明两代，足以继唐宋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后劲。

二

清初的诗人，如林古度、谈迁、朱之瑜、阎尔梅、傅山、黄宗羲、杜濬、方以智、钱澄之、冒襄、归庄、陈忱、顾炎武、吴嘉纪、王夫之、张煌言、黄生、魏禧、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等，始终不肯出仕清朝，坚持民族气节。他们有的直接参加反清的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或不忘

恢复，或以身殉国；有的以死拒绝征辟，有的削发为僧或栖身海外，以避免遭受污辱和迫害；有的藏身草野或流亡江海，甘心过着艰危困苦的生活。他们志行皎然，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爱国诗人。

顾炎武是清初的大学者、进步的思想家，诗学杜甫，功力极深，是当时爱国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个。沈德潜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底，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已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林昌彝评他：“古近体诗沉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认为象《海上》七律四首，“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射鹰楼诗话》）都是切合实际的。顾诗词意坚实，无一长语，苍凉劲健，风骨极高。黄宗羲、王夫之和顾氏齐名，也是当时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两人的民主思想，比顾氏更为激进，但诗的成就不及。黄诗较质朴；王诗瑰丽奥衍，功力亦深，但词旨比较隐僻。有人评王：“诗其余事，词旨深窈，气韵沉郁，读之如观夏鼎商彝，如闻哀猿唳鹤，使人穆然神肃，悠然意远。”“昔人评亭林诗，如泰华秋色；先生则衡岳之云，清湘之瑟，楚材称雄，斯冠一代矣。”（《晚晴簃诗话》）也能得其梗概。王诗以正、补《落花诗》为最有代表性。

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诗的共同特点，是善于以朴素的语言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风格接近唐代的新乐府诗派。在反映民生疾苦之外，阎尔梅又常以悲愤激烈之辞，抒

发反清思想；钱澄之又常以冲淡含蓄之笔，描写田园生活。吴嘉纪终生穷困，和贫苦的农民、盐民生活在一起，滨海人民所受人祸天灾的煎熬，在他的诗篇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留下了斑斑的血泪之痕。有人评他的诗：“工为严冷之词，……凄逸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清史稿·文苑传》）“字字入人心腑”，得“陶杜之真衣钵。”（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过史公墓》、《泊船观音门十首》等，则表现他的爱国思想。

杜濬、归庄的爱国诗篇都写得相当沉痛。杜诗清郁，归诗绵丽，风格又有不同。归庄诗“不信江南百万户，锄耰只向陇头耕。”（《己丑元旦》）表现了对清廷统治的高度愤懑和对人民反抗力量的充分估计，战斗性很强。生年稍后的屈大均、陈恭尹两人，崛起岭南，诗篇皆道壮昂扬，兼具气韵声色之美。《晚晴簃诗话》评屈氏说：“诗自谪仙入，念乱忧生，盘郁哀艳；又以初遭鼎革，每多故国之悲。”评陈氏说：“少遭家国之难，间关江海，飘泊无归，忧愤之志，一形于诗。……其诗真气盘郁，激昂顿挫，在江南所作怀古及《虎丘题壁》诸作，尤倾动一时。王渔洋谓其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屈诗想象丰富，在雄健中有飞腾夭矫之势；陈诗用心细密，在雄健中有沉浑圆美之致，这是两家诗的同中之异。以体裁论，屈诗五律最著，陈诗七律最工。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最著名的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诗的成就不如钱、吴；对后来影响之大，钱又不如吴。钱谦益学问淹博，文

才亦高，为文纵横排奁，规模阔大。论诗反对前、后“七子”的“赝古”，公安派的空疏，竟陵派的狭窄；主张“转益多师”，写性情学问兼济的“有本”之诗。自盛唐、中晚唐、两宋及金朝的元好问诸大家无不学，尤得力于杜甫、李商隐、苏轼、陆游诸家。他与吴伟业都是成名于晚明的人，对明诗的转变和清诗的发展，都起了推动的作用。钱诗数典过多，又好谈禅理，不免蹈驳之病；然材藻丰富，情韵亦佳，是一时大手笔。《有学集》、《投笔集》哀思明亡，寄情恢复，情辞苍郁；然大节已亏，进退失据，论者讥其“矫饰”。吴伟业诗，《四库提要》的评价相当恰切：“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道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吴伟业近体诗稍嫌腴缛，坚苍处不及钱谦益；歌行的风调则胜过钱，后来效法他的很多，直至近代诗人所作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杨圻的《天山曲》、《檀青引》等，都和他的《圆圆曲》等七言歌行一脉相通。

三

在清朝应试、出仕，而主要生活于康熙、雍正时期的诗人，较早的有所谓“南施北宋”两家。施指施闰章，宋

指宋琬。王士禛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施的五言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宋“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时闯韩杜之奥。”（《池北偶谈》）沈德潜说：“南施北宋，故应抗行。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清诗别裁》）施闰章诗学王孟韦柳，追求温粹冲和的风格，故最工五言律；他也写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乐府歌行。宋琬诗学杜韩及陆游，又遭遇困厄，愤激不平，故多雄伟亢厉之音，实际上以七言诗及歌行为胜。

“南施北宋”还不是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首先要推王士禛。王氏的七言近体和吴伟业七言歌行，是清诗中最为独擅胜场和影响最大的作品。王氏论诗，推崇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和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兴趣”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说；标举“神韵”，理论上自成一派。创作实践也相当成功，领袖诗坛数十年。《四库提要》说：“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士禛以“清新俊逸”之才，转移清初“谈诗竞尚宋元”的风气。但又认为他“所称者盛唐，而古体惟崇王孟，上及谢朓而止”，“近体多近钱郎，上及李颀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缠绵，沉郁顿挫，则有浮声切响之异”。杨绳武为王氏写的《神道碑》则说：“公之诗笼盖百家，尽括千载，自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无不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尤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象，意外

之神，不雕饰而工，不锤铸而炼。极沉郁排冢之气，而弥近自然；尽铤刻绚烂之奇，而不由人力。”褒贬颇有不同。王氏处在清朝统治巩固、表面承平的时期，政治条件不容许他走杜甫的大力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道路，模山范水，咏古咏物等正是他最常写的题材。风格上当然不同于杜甫的“忠厚缠绵，沉郁顿挫”，但他入蜀以后刻划山水的诗篇，功力亦有得于杜诗；他的诗得力最深的是王孟一派，但确实对古代大名家，都下过“咀其精华，探其堂奥”的功夫。“沉郁排冢”非所长；但“象外之象，意外之神”确有所擅，近体绝非钱起、郎士元、李颀等人所能限制。他的诗的妙处，在善于融情入景，好整以暇，惨淡经营而出之以平易，涵情绵邈而出之以纾徐；加以音节清远跌宕，意味悠然，故觉神韻卓绝。宋琬说他：“绝代销魂王阮亭”，赞美他独擅的一面；袁枚说他：“一代正宗才力薄”，则指出他的不足之处。

和王士禛齐名的朱彝尊，诗早期学王孟，中学盛唐，晚期趋于平易。《四库提要》评他：“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韻，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士禛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得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朱诗功力不下于王，中期不乏格律工整、宏中肆外的作品；但在迈越故步、独创新貌方面，终不如王。

这时期的诗人，还有尤侗、彭孙遹、梁佩兰、宋荦、吴

雯、洪升等人，诗以疏畅和隽胜；有陈维崧、吴兆骞、田雯、张笃庆等人，诗以豪迈藻丽胜。比较著名的，又有赵执信。赵是王士禛的甥婿，但论诗的旨趣与王不同，所著《谈龙录》，对王颇有讥贬。他于诗颇自负，求去浮靡，力追峭刻，但酝酿不深，规模较狭，成就并不大。他的诗如《毗入城行》写农民对官府的反抗，却是很值得重视的。

可以和王士禛并称为这时期的第一流的诗人，应推查慎行。查氏得力于苏轼、陆游最深，用笔沉着，运思刻入，发扬了宋诗的艺术技巧，是清初学宋诗成就最大的一人。他的诗又讲究音节色泽，兼得唐诗的好处，没有一般宋诗缺乏情韵的毛病，他又可以说是康、雍时出入唐宋、刻意创新的成就最大的诗人。王士禛为他早年的诗集作序，即说：“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查氏的字）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古体“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元遗山、陈后山风。”赵翼《瓯北诗话》更说：“故吴梅村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初白（查氏的号）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初白诗近体最擅长，放翁以后，未有能继之者。当其年少气锐，从军黔楚，有江山戎马之助，故出手即沉雄踔厉，有幽并之气。中年游中州，地多胜迹，益足以发抒其才思，登临怀古，慷慨悲歌，集中此数卷为最胜。内召以后，更细意熨贴，因物赋形，无一字不稳惬。”“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四

在康熙五十九年中举，又生活到乾隆十七年的厉鹗，是继查慎行之后效法宋诗成就较高的一个诗人。厉氏诗源谢灵运和唐代的王孟韦柳，风格与查氏不同。他著《宋诗纪事》，对宋代历史和宋诗研究很精。所作幽峭妍秀，工于炼字，五古尤胜，特别是游西湖诸作，刻琢更为精致。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说他的诗：“莹然而清，窅然而邃，撷宋诗之精诣而弃其疏芜。”厉诗学宋，“疏芜”较少是事实；但宋诗如陆游一派的气魄豪迈的“精诣”，他是“撷取”不到的。他的诗自成一派，世称他为“浙派”的领袖。从他以后的诗人，可以算是乾隆、嘉庆朝的“盛世”的诗人。

生年早于厉鹗，但到乾隆初年才中进士的沈德潜，主要的活动是在乾隆时。他论诗注重“温柔敦厚”，注重“格调”，提倡汉魏盛唐。著有《说诗碎语》，又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原称“国朝诗”）别裁》等书，流行于世。一时吴下诗人，奉为宗主。和崇尚宋诗的“浙派”的厉鹗比较起来，声气更盛，影响更大。他的近体诗如《金陵十首》，颇高亢雄健；古体注意反映现实，语言比较朴素，也有好的作品。但可惜大部分作品封建说教气味太浓，有的语言比较板质，厚重有余，生气不足，创作的成就较差。

乾隆时的钱载，作诗以生涩取胜，在苍劲俚质中别饶

清韻。在当时学唐学宋的诗歌形成“熟调”时，他的诗别具一格，颇能使人耳目一新。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有清一代，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惟一钱箴石侍郎而已。”钱载诗道学气亦重，反映现实少，精神实质不能和杜甫相比；陈衍所说，实际侧重钱的学韩。韩愈古诗有古奥拗硬的一面，钱氏学之，又兼学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杨万里，故以涩硬为宗，以俚拙取神。技巧上有独到之处，但所走的毕竟不是坦途。《晚晴簃诗话》评：“箴石论诗，取径江西，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奥折。用意必深微，用笔必拗折，用字必古艳，力追险涩，绝去笔墨畦迳。”推许颇甚。

在“神韻”、“格调”、宗唐、宗宋的各派诗歌流行之后，相仿相袭，清诗又逐渐形成新的“窠臼”，假如不能别开格局，很快又会走向形式的僵化。这时期的诗人，能开创新格局的代表是袁枚和赵翼。袁、赵和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

袁枚行为倜傥不羈，反对封建道学，同时人或讥他“轻薄”。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通达的。论事论情，务求平恕，敢于薄泥古、崇古的观念，讥讽陈腐的礼教，见识不凡。他论诗反对沈德潜的提倡“格调”，以为会流于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旧框框；反对王士禛的专求“神韻”，以为会流于纤弱和过分“装饰”。他继承、发展杨万里和明代公安派的说法，论诗主“性灵”。所谓性灵，是要求诗歌要写作者的真性情，要有新鲜活泼的灵感的触

发，不可写得陈陈相因，没有个性，没有生气。他的作品，感情奔放，议论新颖，笔调活泼，语言明畅而且句法比较灵活多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但可惜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不少篇章是率意之作，境界趣味不高，流为轻滑。他的作品瑕瑜参杂，但比起同是提倡性灵的公安派作家的作品，还是高出很多，因为他的才学和功力远非公安派作家所能及。

赵翼也是一个学识渊深、思想通达的学者，他的朴素唯物论和历史进化的哲学观点，在当时也是比较进步的。他论诗最强调创新，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诗文无尽境，新者辄成旧”（《删改旧诗作》），“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瓠北诗话》）。他的作品，以五、七言古诗为最有特色。五古如《闲居读书》、《杂题》、《偶得》、《园居》、《山行杂诗》、《书所见》、《静观》等，抒写很多新颖独到的见解，言前人之所未言，内容可取，但有人认为偏于议论是大病。我们看来，赵翼这类诗，议论过多有缺点，可是它又不象宋代理学家的说理诗那样使人厌倦，相反的，读起来往往觉得意味深长。这是因为议论中有作者的新鲜的见解，有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洒脱真实的性格，他的庄谐杂作的风趣，他的对人生世事的合情合理而透辟的分析；并且语言浅显精醇之故。袁枚评说：“《击壤集》、《读书乐》，一经儒家说理，便有头巾气。瓠北此等诗，穿天心入月胁，说理愈精，英光愈迸露，真足为天地间另辟一境。”指出它的成功的一面；当然，赵氏这类

诗，也有不少比较浅率、枯燥的，不能一概而论。他的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绝，颇费匠心经营，也时有新意，但一般说来，格调较“熟”，创造性较少。

总之，袁枚、赵翼诗的出现，有其解放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清诗形式要重新走向僵化的格局，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蒋士铨和袁枚、赵翼的交谊深，作诗也主张戒蹈袭、写性情，和袁、赵有一致的地方。但他对诗的内容强调“忠孝节烈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封建礼教气息较浓；形式上比较重骨力，不那么强调性灵，作风和袁、赵又有不同。袁枚为他的诗集作序，称其诗为“横出锐入”，“神锋森然”；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其诗：“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古又胜于五古，苍苍莽莽，不主故常。”他的《京师乐府词十六首》，反映当时北京的都市生活，生动细致，在他的诗中为别调，但更有现实意义。蒋氏诗的功力不下于袁、赵，但在开新方面的努力和影响，却大有不如。

除袁、赵、蒋三家外，这时期值得注意的诗人还有郑燮、黄景仁、张问陶三人。郑燮早年生活贫困，做过短期的小官，久居民间，同情人民的痛苦，所作古体如《私刑恶》、《逃荒行》、《孤儿行》、《姑恶篇》等，鞭挞贪官污吏的残酷，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语言朴素，描写深刻，富有现实主义精神。

黄景仁出身孤寒，奔走四方以谋生计，为县丞未补官

而卒，年只三十五岁。他是一个终身穷困不得志的诗人。诗从李白、岑参、李贺诸家入手，而才调极高，融通变化，形成独具的风格。他的诗最大的特点是用情极深。无论是缠绵悱恻或是抑塞愤慨之情，都写得深入沉挚，使人回肠荡气，极受感动。其次是语言清切。他善用白描，诗中扫尽浮泛陈旧之词，语语真切；而且一种清新迥拔之气，凌然纸上。其三是音调极佳。王士禛诗在音调上独得纤徐跌宕之妙；黄景仁诗音调和内容紧密配合，悠扬激楚，也特别动人。他的诗辞清而气宕，故哀伤而不流靡，最长于抒情；但如《圈虎行》、《献县汪丞座中观伎》等诗，又可看出他体物叙事的描摹毕肖的功夫。吴锡麒评其诗：“清窃之思，激哀于林樾；雄宕之气，鼓怒于海涛。”（《与刘松岚书》）洪亮吉评其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颇为近似。从整个内容看来，他的诗以写个人的凄凉的身世之感为主，给读者的影响也可能是感伤情绪为多。

张问陶诗重性灵似袁枚，规模才气不及袁，而刻意锻炼则超过；白描翻新似查慎行，学问功力不及查，而情景相生则相近。古体较浅薄；近体空灵沉郁，佳句络绎，大大丰富了这时期诗歌的意境。

生活于乾隆后期和嘉庆朝的诗人舒位、孙原湘、王昙被法式善称为“三君”，有的人认为他们可继袁、赵、蒋三人，称之为“后三家”。三人中王昙的诗最粗犷，成就较差。舒位及孙原湘诗，多出入于李白、李商隐、杜牧、李贺诸家；孙诗富巧思，多丽语，然不及舒诗的才力纵横，富有

奇气。比较起来，“后三家”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已远不及“前三家”了。

乾嘉时期，诗人辈出。才气横溢，工于咏史的，有严遂成；绝句出入中晚唐，风情卓越的有黄任；七律出入苏轼、黄庭坚，劲气盘折的有姚鼐；缜幽凿险，诗中有画的，有黎简；格调秀雅，词采妍丽的，有吴锡麒；气势奔放，语多奇崛的，有洪亮吉；工为艳体，亦擅清才的，有陈文述。这些人也是比较杰出的，可以作为这时期的诸大家的羽翼。

五

清朝到了道光、咸丰时期，政治上沿着衰落腐朽的方面发展，阶级矛盾尖锐化，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部爆发了太平天国的大规模的革命，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演变而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开始了历史的新阶段——近代史的阶段。清诗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为开山的具有近代民主思想色彩的诗歌；一方面出现了以祁寯藻、曾国藩为首的提倡江西派、提倡“合学人诗人之诗为一”的诗歌。较著名的作家有郑珍、何绍基、金和、黄遵宪等人，以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认为这个时期清诗才有“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的。

《清诗选》选录从顺康到乾嘉时期的诗歌。我们主观上在照顾代表作家风格和他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也选录一